

哲學系何信全教授是從儒學與自由主義看梁啟超思想的演變，歷史系薛化元教授則從改革與革命這個角度看梁啟超，兩篇文章把梁啟超一生的主要活動內容再作檢討，都扣緊此次會議的主題。此次會議邀請方家學者參與，相信在討論過程中一定會激發許多新的論點，會後如果作者願依各方意見修改其論文，一定為學術界所樂見。

陳百年先生對本校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他的遺愛——〈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鼓勵文學院舉辦這項意義深遠的研討會，而教育部顧問室的支持，則讓我們有足夠的經費使會議順利召開。對此，本人謹代表政大文學院的同仁致萬分的謝意。也由衷地感謝辦理會議同仁的辛勞。

張哲郎 謹識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戊戌之後：梁啟超、黃遵憲的生命同調 與思想歧路

張堂錡

政治大學中文系

以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為先導，發生於十九世紀末的「百日維新」變法，是中國近代維新運動史上最富象徵意義的一次行動。它既是同光年間以李鴻章為中心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的延續，也是後來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主導之革命運動的轉捩點。自強運動在甲午一役遭到重創，百日維新則在戊戌政變後銷聲匿跡，正因為自強、維新的思想啟蒙與知識積累，才有畢其功於一役的辛亥革命。因此，維新變法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假如說，整個維新運動是從「公車上書」揭開序幕，而以「百日維新」後的戊戌政變黯然落幕，則此一運動過程中，真正將維新理念與行動具體落實且積效卓著，進而促成百日維新者，則非湖南新政莫屬。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維新派人士如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先後入湘，使維新變法思想獲得一次實際操兵的機會，且在中國十八行省推行新政

中，締造了最具規模與成效的局面。康有為在《人境廬詩草·序》中即指出「中國變法，自行省之湖南起」；學者鄭海麟也認為「真正賦予維新運動以實踐意義的，應是湖南新政」¹。雖然，陳寶箴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被任命為湖南巡撫起，便積極推行維新變法主張，但光緒二十三年六月，黃遵憲被派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理湖南按察史，不久，譚嗣同好友徐仁鑄接任湖南學政，這三人的組合，才使維新運動在湖南轟轟烈烈展開，而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都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毫無疑問的，發生於戊戌變法前一年的湖南新政，「不僅於時間上早在百日維新之先，實且直接為百日維新的前導」。²正因為如此，戊戌政變作，凡與湖南新政有關者均受到波連，如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遇害，陳寶箴、江標、徐仁鑄、熊希齡等人皆革職永不敘用，黃遵憲則罷官放歸原籍。可見，湖南新政的成功，確實為北京新政打了一劑強心針。而湖南新政的成功，黃遵憲可謂居功厥偉。梁啟超曾說：「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³；正先更認為黃遵憲「不啻陳右銘中丞之靈魂」⁴。事實上，在來到湖南之前，黃遵憲早已是出使過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的資深外交官；也曾受張之洞之命，主持江寧洋務局，辦理五省堆積之教案，為人稱道；也以《日本國志》得到翁同龢賞識；李鴻章更以「霸才」稱許之。不論資望、閱歷、學識、才幹，黃遵憲都在湖南維新派諸人之上。他受陳寶箴之倚重，使湖南新政大刀闊斧改革有成，自不令人意外。

不僅如此，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變法，當康、梁等人在

¹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6月），頁396。

² 見王德昭，〈黃遵憲與梁啟超〉，收入張灝等著《晚清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69年6月），頁639。

³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68年9月），頁90。

⁴ 正先，〈黃公度——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逸經》文史半月刊第十期，1936年，頁18。

北京熱烈推行之際，光緒帝曾向翁同龢索閱《日本國志》，後更命黃遵憲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連續下詔傳令迅速來京。正先〈黃公度——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一文，對此有一種說法：

光緒早有重用公度之意。戊戌年間，陳寶箴、公度等在湘推行新政已有成效，梁任公、譚嗣同等由湘趕程入京活動，以待公度之來。光緒已以譚嗣同、楊銳、劉光第等為章京，軍機大臣之職則擬以公度任之。俾得總領中樞，實施新政。復慮公度官銜不高，不足以當軍機大臣之任，特簡公度出使日本以提高其資格，兼使在外作外交上之聯絡，預計公度留日本半載所辦之事已有頭緒，即調之返京也。⁵

此一說法或非虛語，王德昭即引其他資料而贊同正先之說云：「康、梁和楊、劉、譚、林諸人，於當時政局究屬新進，不如遵憲雖亦屬維新人物，然為皇帝所特知，而又資望閱歷足以膺大拜之故」⁶。只可惜，黃遵憲因病耽擱赴京，而不久京變已作，康、梁出走海外，黃遵憲則免官放歸。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甚多，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值得注意的是，黃遵憲在整個維新變法運動中，實居一重要地位。在湖南，他幾乎一手擘劃新政；在北京，他雖未親身參與，但對光緒帝、康、梁等人推行新政的決心有強化之作用，卻是無庸置疑的。也是在這一場為時不長的運動中，黃遵憲與梁啟超建立起了革命情誼，成為思想上的夥伴。如前所述，黃遵憲在當時的地位、聲望均在梁氏之上，而且黃遵憲長梁啟超二十五歲，二人卻能成為忘年之交，在戊戌之後，仍透過書信往返，流露出道義之交的惺惺相惜，實為維新運動史上的一頁佳話。黃遵憲卒前一年有書致梁啟超曰：「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而且生前即吩咐其弟黃遵庚請梁啟超寫墓誌銘，足見其對梁氏愛重之殷；在墓誌銘中，梁啟超則謂：「以弱齡得侍先生，惟道惟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

⁵ 同前註，頁19。

⁶ 同註二，頁637。

噢振厲，拳拳懇懇，有同疇昔。」在《飲冰室詩話》中，他也引「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來表達他對黃遵憲的敬重與哀悼之意。正是這種深刻理解的生命同調，使他們攜手投入維新大業中，也是這種生命同調，兩人見解頗多略同，即使有些歧異、論辯，也不曾動搖過兩人自湖南新政以來所建立的互信互敬之深刻情誼。

二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三月，年近五十的黃遵憲，邀請二十四歲的梁啟超至上海擔任《時務報》主筆，從此開始二人的情誼。梁啟超在其《三十自述》中對此有所記載：「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然而，當年九月，黃遵憲奉旨入覲，離滬赴京。梁啟超則透過《時務報》，嶄露頭角，開始他一生輝煌筆政生涯。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徐仁鑄傳〉中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這一點，不能不說是黃遵憲有識人之明。次年六月，黃遵憲回到湖南。十月，梁啟超又在黃遵憲的舉薦下，到湖南擔任時務學堂講席，一起參與湖南新政。但是，兩人短暫相處後，光緒二十四年初，梁啟超赴北京參與百日維新，從此兩人即未曾再見過面。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海外，至辛亥革命後才返國；黃遵憲則罷官歸里，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病逝。換言之，兩人自始交至黃謝世，不過十年，而實際共事相處，不過十月，但是，如此短暫的時間，卻絲毫不曾影響兩人知音相惜的忘年交誼。

平心而論，梁、黃二人論交，黃氏主動居多，且黃氏愛才之情亦溢於言表。例如上海初識後，黃遵憲有〈贈梁任父同年〉六絕句，末章詩云：「青者皇穹黑劫灰，上憂天墜下山隕。三千六百釣鼈客，先看任公出手來。」對年輕的改革家梁啟超寄予厚望；《人境廬詩草》最後一首〈病中紀夢述

寄梁任父〉中云：「與子平生願，終難儻所期」，「何時睡君榻，同話夢境迷？」既有抱恨之志，也有勉勵梁啟超之情。當黃遵憲讀到梁啟超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時，立刻去信表示贊同，且說：「僕之於公，亦猶耶之保羅，釋之迦葉，回之士丹而已。」當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報》，黃遵憲也去信說：「努力爲之，空前絕構之評，必受之無愧也。」⁷對梁啟超之高度期許始終未變，而且從早期的以國政世局爲主，到晚年的擴大到文化、教育、學術等各方面，可以說，黃氏晚年真正的知交當屬梁啟超爲最。也因此，黃遵憲晚年想寫《演孔》一書，寫信和梁討論，提到：「今年倘能脫稿，必先馳乞公教，再佈於世。」由於兩人對時局有許多共同看法，書信往返不免多有傷時過激之語，黃遵憲也不忘提醒道：「蓋書中多對公語，非對普天下人語」，推心置腹之意，不言可喻。

至於梁啟超，對黃遵憲則是介於師友之間，執禮甚恭。這一方面是因爲年齡差距，一方面梁也確實敬服黃遵憲的學識、見解。據吳天任編著《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中云：「任公每欲拜之爲師，先生素鄙換帖拜師俗習，婉言辭之，謂彼此作忘年交可耳」⁸。這是兩人在上海合作編《時務報》時之事。同年十一月，梁啟超爲《日本國志》撰後序，說讀了此書後，「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閨闈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認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對《日本國志》真有相見恨晚之慨。而且透過此書，他對黃遵憲的學養大加稱許說：「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⁹。當梁啟超欲動筆寫《曾

⁷ 黃遵憲與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八年通信頻繁，部分刊於梁啟超主辦之《清議報》、《新民叢報》，好事者彙而存之，稱爲《壬寅論學牋》。此引自吳天任著《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2年），頁280。

⁸ 吳天任編著，《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7月），頁100。

⁹ 梁啟超，〈日本國志後序〉，收於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0年1月），頁1004。

國藩傳》時，也事先請黃遵憲提供意見。至於兩人在《壬寅論學牋》中鴻雁往返、長篇大論的表現，也可看出梁啟超對黃遵憲諸多看法的重視與肯定。甚至於，梁啟超的許多見解與作為，都可以看到黃遵憲的影子。由此可以看出兩人彼此間相知相重的師友風義。而兩人自上海論交到湖南共事，同為維新事業奮鬥，又在戊戌政變後同遭黨禍，歷生死之患難，兩人建立在生命同調上的革命情感，同樣不言可喻。

作為晚清一名憂心國是的知識分子，擁有十餘年外交折衝生涯的珍貴經歷，黃遵憲的政治理念與維新思想，對戊戌變法及維新派人士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其中，受其影響最深的就是梁啟超。戊戌之後，與黃遵憲詩文唱和最多的是丘逢甲，而書牘最頻關切最深的是梁啟超。透過十餘萬字的書信，兩人在思想上或相啟發，或相論辯，或相鼓舞，或相規勸。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言：「公度有如任公的海上明燈，荒漠中的甘泉，困惑時求指引則得指引，氣餒時飲甘泉則鼓舞重振」¹⁰。梁、黃二人在精神意志上的感通，不僅不隨歲月而磨滅，反而益增其深厚之誼。黃遵憲識見高遠，處事精密；梁啟超才華橫逸，年輕有為。兩人彼此欣賞，相互敬重，這說明了兩人在人格態度、人生思想及生命情調上，確實有著強烈的認同感、極大的相似性與共同一致的理想追求。

三

梁、黃二人的生命同調，不僅表現在彼此生活關懷的真切上，更重要的是所見略同的相知相惜，與著述砥礪的互勉互助上。例如兩人對「合群之道」的看法就很一致。梁啟超在《新民說》第五節「論公德」中主張：「吾輩生於此群之今日，當發明一種新道德，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遂自畫而不敢進也」，「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

¹⁰ 引自吳天任編著《黃公度先生傳稿》，頁 596。

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在私德與公德之間，他強調要提倡公德、群學，認為我國人不群的原因有四：一為缺乏公共觀念；二為界說不明確；三為無規則；四為忌妒心使然。黃遵憲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十一月致梁信中，對此甚表贊同，認為是「至哉言乎」，並進一步提出他個人對合群之道的主張：「族群相維相繫之情，會黨相友相助之法，參以西人群學以及倫理學之公理，生計學之兩利，政治學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後可進以民權之說。」黃遵憲提出切實可行之道，與梁啟超的理論恰可互補，對時弊人心之評確是一針見血。黃遵憲對《新民說》極表推許，在信中難掩驚喜地說：「公所草新民說，若權利，若自由，若自治，若進步，若合群，皆吾腹之中所欲言，舌底筆下之所不能言」，「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盡取而發揮之，公誠代僕設身此地，其驚喜為何如矣！」此驚此喜，說明了兩人生命同調之深刻。

在對基礎教育的重視與編寫教科書方面，兩人也是同心協力。當然，這主要是黃遵憲主動提出，而梁啟超則欣然應和。戊戌之後，黃遵憲家居講學，因為日本經驗，他特別重視改革教育，主張通才教育，在《壬寅論學牋》中，他再三強調德智體群各育發展，呼籲重視蒙學小學中學與普通學，以樹立教育基礎為要。本此宗旨，他力勸梁啟超編寫教科書。光緒三十年七月信中，他就替梁氏規劃了今後可以努力的方向：「僕為公熟思而審處之，誠不如編教科書之為愈也」，因為「僕近者見日本以愛國心團結力摧克大敵也」，而日本「專以普及教育為目的」。再加上梁啟超文筆「有大吸力」，可左右讀者思想，因此，在三十一年元月信中，他再度表示「望公降心抑志，編定小學教科書，以惠我中國，牖我小民也。」對此鼓勵，梁啟超果然就編寫了《國史稿》二十萬言，「以供學校科外講讀之一用」。接著又寫了《中國之武士道》一書，「為學校教科發揚武德之助」。這顯然是受到黃遵憲的指引所致。而黃遵憲自己也創作過〈幼稚園上學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等，被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譽為「一代妙文」。這些作品，都是兩人「所見略同」下的產物。

黃遵憲雖無創作小說，但對文學大眾化的推動卻是倡導甚力，對小說

的作用與價值，兩人也都持高度肯定的態度。早在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出使日本，與日本友人筆談時，黃遵憲就曾對石川鴻齋說：「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並妙」¹¹。因此，當梁啟超在日創辦《新小說報》，他聽聞後立刻馳函表示讚許：「公乃竟有千手千眼運此廣長舌於中國學海中哉！具此本領，真可以造華嚴界矣。」不久得閱，又去信表示：「《新小說報》初八日已見之，果然大佳，其感人處竟越《新民報》而上之矣。」同時對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深致欣賞，對《新中國未來記》、《東歐女豪傑》、《新羅馬傳奇》等小說，更是讚不絕口地說：「吾當率普天下才人感謝公」，並勉勵梁啟超「努力為之，空前絕構之評，必受之無愧也。」兩人在對小說的諸多看法上，事實上極為相近，見解也都極為新穎。黃遵憲的激賞，完全顯現出對後輩不吝提攜的真性情。

黃遵憲對梁啟超小說的稱許，一如梁啟超對黃遵憲詩歌的肯定。《飲冰室詩話》云：「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為近世詩界三傑」；「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凡此均可看出梁啟超對黃詩評價之高。事實上，梁、黃二人是晚清「詩界革命」運動中的主將。這場運動是伴隨著政治維新的大趨勢，而被維新派人士提出。對小說社會功能的重視，使他們喊出「小說界革命」；對詩歌新意境的講求，則喊出「詩界革命」。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載其《飲冰室詩話》，以其帶情感的文字，提倡有別於傳統的詩歌新嘗試，而黃遵憲則以其《人境廬詩草》中的佳作，成為梁氏心目中「詩界革命」的代表作家之一。《飲冰室詩話》說：「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當讀到〈今別離〉四章，梁啟超說可以「生詩界天國」；讀到〈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他又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黃遵憲自己也以「新派詩」人自居，

¹¹ 見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7年），頁183。

在〈酬曾重伯編修〉詩中說：「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¹²。梁啟超正是對此有深刻理解，才會說黃遵憲是一「銳意欲造新國」¹³的人物，並且推崇不已。

「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主張，實開五四時代新文學的先河。梁啟超與黃遵憲的許多看法，對胡適想必是有所啟發的¹⁴。梁、黃二人詩歌主張的接近，魏仲佑曾有所析論：

「詩界革命」時期梁氏的文學思想大體上已開了「五四」時代文學思想的先聲。然而梁氏的文學思想早有黃遵憲開其先河，以梁氏主張民歌俗語可入詩，而黃則云：「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梁氏主張不可崇古人，黃則云：「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梁氏主張「詩外常有人」，黃則主「要不失乎為我之詩。」

¹⁵

梁、黃二人都是維新思潮下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對詩界「革命」的定義，只是如《飲冰室詩話》說的「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黃遵憲之所以備受梁氏推崇，是因他的詩「能融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所謂「新理想」，是指題材、語言及意境三者的融合創新，而「舊風格」，則是指傳統詩歌格律、形式的繼承遵循。換言之，他們所主張的，是要通過舊形式來表現新的生活內容和新的思想情感，由於並未觸及到詩體解放的根本核心，因此，他們兩人都只能算是「舊瓶裝新酒」的實踐者，而非「新瓶裝新酒」的提倡者。不過，他們的主張與嘗試，確實在晚清盛行宋詩的風氣

¹² 見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八。

¹³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收於《新大陸遊記節錄》（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46年11月台一版）附錄一，頁153。

¹⁴ 可參看張堂錡，〈論黃遵憲與胡適的詩歌改革態度〉，《從黃遵憲到白馬湖——近現代文學散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5年7月。

¹⁵ 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83年12月），頁277。

下，擴大了詩歌表現的領域，突破了舊體詩的束縛，賦予詩歌活潑的生命力。這種對詩歌看法的一致，也印證了兩人在生命情調、學術眼光上的有志一同。

除了以上所提，在對「新民說」、重視基礎教育、編寫教科書、主張「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方面的見解一致外，兩人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同樣激賞。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章說：「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而黃遵憲則在給梁啟超信中稱譽此書有「卓絕過人之識」。又如對「天演論」的進化思想，兩人也同樣接受、信服。梁啟超《新民說》的基礎就是「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不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的看法¹⁶；而黃遵憲在光緒二十八年致嚴復信中曾說：「《天演論》供養案頭，今三年矣」，致梁啟超書中則表示：「近方擬《演孔》一書，凡十六篇，約萬數千言」，其參考書目，有培根、達爾文之書¹⁷。以上這些都足以說明兩人對時局，對文化，對學術，對教育，對文學等多方面，實有著極大的相似性。這些見解的一致，正是兩人敢於冒著戊戌之後，情勢仍肅殺緊繃的危險，不斷透過書信交換意見、互相鼓舞的心理基礎。就某個層面來說，兩人相見恨晚，在黃遵憲晚年的頻繁交往，是因為彼此找到了可真心討論的對象，許多議題，只有向對方傾吐才不致「對牛彈琴」，一些計畫，也只有向對方尋求支持，才有更大的勇氣或決心來付諸實踐，這不就是難得的知音共賞、生命同調嗎？

四

梁啟超與黃遵憲的生命同調，已如上述，但是，兩人之間畢竟仍有許多不同之處。以性格言，黃遵憲穩重、幹練，謀定而後動，思慮精密，且觀察細微；梁啟超則滿腹才情，靈思多變，謀慮雜複，情緒相對波動較大。

¹⁶ 梁啟超，《新民議·敘論》，《飲冰室文集》之七（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106。

¹⁷ 同註四，頁20。

黃遵憲就曾在信中多次指出梁在性格上的缺失，如「公之咎，在出言輕而視事易耳」、「公之所倡，未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爭，造極端之論，使一時風靡而不可收拾，此則公聰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誤也」等，這都是中肯的論，既可見二人交誼，也可知黃遵憲識人之明。梁啟超的一些看法，黃遵憲若不同意，會馳函直言，以理規勸。而事實上，梁啟超正因為有此一諍友，而在思想發展上多次轉折、收斂，免於太過。在一些關鍵問題，特別是政治與學術見解上，梁與黃初始異而後轉同的歷程，可見出黃對此一「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¹⁸的朋友，確實是產生過極深刻的影響。

以梁啟超與康有為因保教尊孔主張不同導致師徒在思想事業上分道揚鑣一事為例，黃遵憲在其中即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維新運動起，康有為大力提倡尊孔保教，要託古改制，立孔教為國教，立孔子為教主，梁啟超從其師說，也有保教主張，在湖南任教習時，即「間引師說」，後「經其鄉人鹽法道黃遵憲規之，謂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漸知去取」¹⁹。黃遵憲勸梁啟超說：「南海見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為泰西富強由於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敵之。不知崇教之說，久成糟粕，近日歐洲如德，如義，如法，……於教徒侵政之權，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襲人之唾餘，以張我教，此實誤矣。」他認為「孔子為人極，為師表，而非教主」、「大哉孔子！包綜萬流，有黨無仇，無所謂保衛也。」不設教規，也無教敵，更不會樹幟自尊，強人從之，因此，他強調「今憂教之滅，而倡保教，猶之憂天之墜，地之陷，而欲維持之，亦賢知之過矣」²⁰。黃遵憲的見解對梁啟超影

¹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8月），頁88。

¹⁹ 原為湖南巡撫陳寶箴上奏朝廷，請旨銷毀《孔子改制考》一書之內容，見《覺迷要錄》卷四，頁22，轉引自王德昭〈黃遵憲與梁啟超〉一文。

²⁰ 這是黃遵憲於光緒二十八年致梁啟超信中，回憶昔年在湘時一次演講的內容。因為光緒二十七年，梁撰《南海康先生傳》，其第五章為「宗教家之康南海」，謂康有為「以孔教復原為第一著手」，欲尊孔子為教主，以敵佛耶回諸教。黃遵憲於二十八年四月與啟超信中論及此事，提起昔日在湘時的一些觀點。見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頁256

響甚大，使他「漸知去取」，雖然「依違未定」，但態度已有所轉變。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提出「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教非人力所能保」、「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孔教無可亡之理」等觀點，公開否定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說。從昔日「保教黨之驍將」，成為「保教黨之大敵」²¹，其思想主張已與黃遵憲趨於一致。因此，當黃遵憲讀了梁啟超這篇文章後，忍不住寫信給梁說，弟侄輩「近見叢報第二篇，乃驚喜相告，謂西海東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這說明了兩人在這方面的見解已經「心同理同」，而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在思想上則是步上分途。梁啟超自謂：「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以為然，屢起而駁之。……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²²。康、梁在思想上的背道而馳，黃遵憲在湖南「南學會」的言論，以及對他的規勸，必然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梁啟超一度主張國粹主義，甚至想倡辦《國學報》，因為他鑒於日本近年來「保存國粹之議起」，對中國來說，「國粹說在今日固大善」²³。他將創辦《國學報》的計畫及宗旨與黃遵憲商量，黃遵憲並不附和，寫信規勸梁啟超說：

持中國與日本校，規模稍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己身在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

至 259。

²¹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九，頁 59。

²² 同註十八，頁 88-91。

²³ 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光緒二十八年條，頁 153。

開門戶，容納新學，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²⁴

因此，他建議「公之所志，略遲數年再為之，未為不可。」希望梁啟超努力介紹西學，而非急著保國粹，只有使中西之學相互競爭，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學術文化向前發展。他的論點精闢，情理兼融，甚具說服力，梁啟超終於放棄創辦《國學報》的計畫。這是又一次兩人思想初始歧異後趨一致的經驗。

光緒二十八年是梁啟超思想轉變起伏最大的一年。三十歲的他正處於新舊思想交替之關鍵，而這一年也正是他與黃遵憲書信最頻密之年，其受黃之影響可想而知。康、梁分途後，梁之思想轉趨激進，一連發表了〈論進取冒險〉、〈論自由〉、〈論進步〉等文，鼓吹破壞主義，提倡冒險進取精神，認為「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我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絰而哀之」²⁵。黃遵憲對此不表同意，但不像康有為疊函嚴責，而是以理服之。黃遵憲在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致啟超書中表示，對《新民說》甚表讚許，但「讀至冒險進取破壞主義，竊以為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也。」原因有二：一是列強環伺，國家面臨瓜分之危，「革命破壞」之說將加速滅亡。他說：「誠知今日之勢，在外患不在內憂也。……而愛國之士，乃反唱革命分治之說，授之隙而予之柄，計亦左矣。」他不主張在此時遽行革命破壞，而強調進步必須積漸以成，「僕以為由野蠻而文明，世界之進步，必積漸而至，實不能躡等而進，一蹴而幾也。」第二個原因是「民智未開」，「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刃自戕者幾希！」基於這些現實原因，他反對

²⁴ 見黃遵憲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復梁啟超書，引自《黃公度先生傳稿》頁 255。

²⁵ 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飲冰室全集》之二（台北：文光圖書公司，民國 48 年 11 月），頁 14。

梁主張之革命破壞說。

黃遵憲認為，目前應「或尊主權以導民權，或倡民權以爭官權，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因勢而利導之，分民以權，授民以事，以養成地方自治之精神。」他也再度鼓勵梁啟超在民智未開之時，「願公教導之，誘掖之，勸勉之，以底於成；不欲公以非常可駭之義，破腐儒之膽汁，授民賊以口實也。」經過一番懇切的勸說，梁啟超「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的激昂情緒，應該得到一定的消解作用。

在這封信中，黃遵憲也再度申論他對中國政體的主張，認為「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為立憲政體」，而理想中的立憲政體，是要師法英國。他對梁啟超說：「公言中國政體，徵之前此之歷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為師，是我輩所見略同矣。」在信末，他作一結論道：「然而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之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換言之，黃遵憲是主張君主立憲的。同年五月間，他還曾有一信給梁啟超，書中自述其一生政治主張的變化，從初抵日本，讀了盧梭、孟德斯鳩之說，「以為太平世必在民主」，及遊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政黨之橫肆，……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尚如此，況民智未開者乎？」，再經過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為政體當法英」。他在信中強調，雖然近來革命、分治等主張囂然塵上，但他「仍欲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僕終守此說不變」。從醉心民主共和到以君主立憲為依歸，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從學日、學美到學英，也經過一番探索與掙扎。

有趣的是，同年十月，梁啟超在其創辦的《新小說報》上發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闡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以往主張之「革命破壞」說已有所修正。在小說第三回〈論時局兩名士舌戰〉中，主張革命、排滿、破壞的李去病和主張實行君主立憲、開民智的黃毅伯兩人辯論救國之道，最後勝利的是黃毅伯。這說明了梁、黃二人在政見上又已經轉趨相近。也因此，在同年十一月信中，黃遵憲才會高興地說：「《新中國未來記》表明政見，

與我同者十之六七。」

光緒二十九年元月至十月，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遠遊新大陸，對美國的共和政體和舊金山的華人社會做了一番考察。他目擊「美國爭總統之弊」，有「種種黑暗情狀」，遂「深嘆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也」²⁶；而觀察了舊金山華人社會後，他發現華人因為缺少政治思想、自治能力，即使在美國這種文明程度較國內華人高的環境下，尚不能達文明之境，形成一有秩序的華人社會，因此，在我同胞未具有「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的情形下，他認為，共和政體不合我國情，如欲強行之，「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制」，「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他甚至於說：「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²⁷。此後一直到辛亥革命，梁啟超的政治主張都在君主立憲上了。從保皇、革命破壞到君主立憲，梁啟超也經過了一番思考與掙扎，這種心路歷程的轉變，通過同樣對日、美政情多所留意的黃遵憲幾次書信勸說及鼓勵，想必發揮了一定的影響作用。這是又一次梁、黃二人在思想歧路上轉趨一致的經驗。

類此經驗不止一端。如兩人對曾國藩的看法，原本明顯不同，但在書信討論之後，梁又做了一些修正。在《新民說·論私德》中，梁啟超毫不掩飾他對曾國藩的崇拜：「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因為曾國藩「能率屬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為此，他還發願欲替曾國藩作傳。當他把這一計畫向黃遵憲表明，並請黃評曾之為人，黃遵憲在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信中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曾國藩「其學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科學、之哲學未夢見也。」對其學問表示質疑；接著又評論其功業雖然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

²⁶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頁65。

²⁷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頁86。

弼為甚，「然彼視洪、楊之徒，張（總愚）、陳（玉成）之輩，猶僭竊盜賊，而忘其為赤子，為吾民也。」又說：「此其所盡忠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在外交上，曾國藩「務以保守為義」，對「歐美之政體，英法之學術，其所以富強之由，曾未考求」。最後，他下一結論道：「曾文正者，論其立品，兩廡之先賢牌位中，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可見黃遵憲對曾國藩的評價大致是貶多於褒的。

黃遵憲並非完全否定曾國藩的人品、事功與地位，他也持平地認為曾國藩為一名儒、名臣，對曾「遣留學生百人於美國，期之於二、三十年前，歸為國用」之舉，表示贊同。如此實事求是、客觀理性的批判，顯然影響了梁啟超，因而打消了寫《曾國藩傳》的念頭。梁啟超還曾於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死後，為作一傳《李鴻章》（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書中對李鴻章有極高的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認為其一生功業，已躋歷史名臣霍光、諸葛亮、郭子儀之列。但是黃遵憲顯然對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均無好感，當李鴻章死時，他作〈李肅毅侯挽詩〉四首，其中有云：「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對李鴻章締結《中俄密約》，出賣國家、開門揖盜的作法深表不滿。不過，對此梁啟超在傳中也同感憤慨，認為是「鑄大錯」，且「吾於此舉，不能為李鴻章恕焉矣！」在這一點上，梁、黃二人看法一致。但對李鴻章的整體評價，黃遵憲則不表贊同。有學者認為黃遵憲致梁啟超言及曾國藩傳一信，是「一篇黃遵憲與洋務派最後劃清界線的聲明書，是對洋務派思想進擊的錚錚檄文」²⁸，此說大致不差。

以上所述，梁、黃二人在一些看法上的初始歧異，經過書信討論之後，梁啟超大都能接受黃遵憲的規勸，或改弦易轍（如保教尊孔說、革命破壞說），或中止計畫（如創辦《國學報》、撰《曾國藩傳》），或改變立場（如

²⁸ 盛邦和，《黃遵憲史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63。

接受君主立憲主張）等。由此可以看出，黃遵憲對年輕的梁啟超在思想上確實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五

不過，有些見解，梁、黃二人確實是走在歧異的兩條道路上。當梁啟超接受君主立憲說後，黃遵憲的思想卻已經明顯地具有同情排滿革命、追慕民主共和的傾向，這主要見於他臨終前一年，即光緒三十一年元月十八日致梁啟超之信，這是其絕筆信，應可視為其最後之主張，信中指出：「若論及吾黨方針，將來大局，渠意（按指熊希齡）蓋頗以革命為不然者。然今日當道實既絕望，吾輩終不能視死不救，吾以為當避其名而行其實，其宗旨，曰陰謀，曰柔道；其方法曰潛移，曰緩進，曰蠶食；其權術曰得寸則寸，曰避首擊尾，曰遠交近攻。」而黃遵憲《人境廬詩草》最後一首〈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中也提到：「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可見黃遵憲此時已對廢除帝制、民主共和的主張有所接受。雖然他所提出的潛移、緩進諸法，仍不脫維新改良的思維模式，但其思想確實已經有所改變。

黃遵憲這個思想上的轉變，在他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致梁啟超信中已可看出一點端倪，他說：「棄而不可留者年也，流而不知所屆者勢也，再閱數年，嘉富汨變為瑪志尼，吾亦不敢知也。」從溫和緩進的嘉富汨，變為激進革命的瑪志尼，晚年見國是蝸蟬而壯心不減的黃遵憲，很難說在他心中沒有這樣的想法。即使在最後致梁啟超詩中有「我慚嘉富汨，子慕瑪志尼。與子平生願，終難償所期」的感慨，但他從溫和轉向積極，不排斥革命的思想，恰好又與梁啟超放棄革命轉向君主立憲的立場分道而馳，從這一點看，兩人對政體主張已逐漸走向思想歧路了。只可惜，黃遵憲尚未完成由改良到革命的轉變即過世，也就在黃過世的光緒三十一年，梁啟超開始與清政府中的憲政派人士交往，而《新民叢報》與《民報》的立憲與革命之戰，也即將展開。對梁啟超而言，革命已遠，但對黃遵憲來說，

革命或許才正要開始。

作為清末尋找救國良方的知識分子，梁、黃二人不管其選擇、主張，是否符合後來歷史發展的軌跡，他們汲汲追求的意志，不畏艱危的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思想轉變，常常是因為外在條件、形勢的改變所致，面對清末這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這些知識分子都企求能摸索出一條救國治國的大道，梁、黃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歧異的只是不同階段的方法策略，相同的則是淑世懷抱，知己情義。這一點，兩人顯然是體會甚深，也彼此珍惜。對梁啟超思想言論常前後矛盾的現象，作為知友，黃遵憲會不客氣地批評說：「言屢易端，難於見信，人苟不信，曷貴多言！」（光緒三十年七月致啟超書）；但對梁啟超在思想道路上的猶豫、掙扎與艱辛，黃遵憲也不吝給予真誠的鼓舞：「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來磨折，苟深識老謀，精心毅力，隨而增長，未始非福。公學識之高，事理之明，並世無敵；若論處事，則閱歷尚淺，襄助又乏人，公齡甫三十有三，歐美名家由報館而躡居政府者所時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光緒三十一年一月致啟超書）稱許梁啟超才學「並世無敵」，憂其「襄助乏人」，情真意切。梁啟超何其幸也，得黃遵憲一知己，而黃遵憲晚年對此一後輩的提攜鼓勵，其實也寄寓著自己許多難言之志、未竟之業。一個月後，黃遵憲即病逝，或許正因自己行將辭世，才有憂梁「襄助乏人」之語。這種知己論交的生命同調，確實令人感動。

從上海初識，湖南共事，到戊戌歷難，再到壬寅論學，黃遵憲晚年將希望寄託於梁啟超身上，而梁啟超也時相請益，對黃之教誨，感之在心，並因此有許多思想上的改變。雖然仍不免有時會沿著兩條不同的軌跡前進，但在戊戌維新事業上，兩條軌跡曾並行不悖地疾馳，在對文學、教育、學術、政治的一些主張上，更曾經重疊或合併。但是，在梁三十三歲之齡，黃遵憲辭世，此後的人生道路，梁肯定是寂寞許多，因為，他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同志與同道。「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梁、黃二人生命同調的言論與革命情感，不能不說是清末維新運動史上值得書寫的一頁佳話，而其二人在思想歧路上跋涉的身影，同樣是觀察晚清知識分子感時憂國襟抱的一個生動縮影。

私領域中的梁啟超

李淑珍

台北市立師院社教系

（一）從「人間四月天」談起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每個準備過聯考的台灣高中生大概都會背上這麼一句。可是，梁啟超「究竟」是誰？對於迷上公視連續劇「人間四月天」的網路世代而言，與其說他是清末立憲派的大將、民初護國倒袁運動的領袖，或筆鋒常帶感情的啓蒙先驅、開啓中國現代史學的鉅子，不如說他是徐志摩的老師，林徽音的公公，那個在徐志摩、陸小曼婚禮上大罵新郎新娘的證婚人吧：

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們這次是最後的一次結婚！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嚴肅的學界研究之下，梁啟超已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符號、一個圖騰，代表某種運動、領導某些思潮；梁啟超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魅力與真實性，不容易讓人感受領略得出來。而這齣戲使